

建安文士書體文章的詩化風采及美感特質探究 ——以《文選》「書」類為主要討論範圍¹

溫光華²

摘要：書信體是文人「心聲之獻酬」，兼具實用性及美感，在《文選》所收錄各體作品中，數量僅次於賦與詩，在「文」性質的各體類中，則屬數量最多者，具有一定重要性。本文以《文選》所收錄建安文士「書」體文章為主要探討範圍，分別從憂生傷逝之情懷、縱橫馳騁之文思、駢辭儷偶之句式以及用典曲喻之修辭等四方面，考察諸篇書體文章所展現的詩化風采及文學審美特質。前兩項主要是就創作主體的情懷及文思表現展開探究，看書體文章如何體現詩化人生的具體內涵，以及建安時代文士以「志深而筆長」為宗的文學風尚；後兩項則從作品本體進行檢視，分析書體辭章體勢所呈現的詩化特徵，凸顯其具有文人作風的一面。期透過此一主題的探討，可凸顯書信體製的文學性，也可從中窺見建安文士的心聲及風采。

關鍵詞：書信、建安文學、詩化風采、昭明文選

¹ 收件日期：2024/04/22；修改日期：2024/07/31；接受日期：2024/08/07

² 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專任副教授

On the Poetic Style of Letters in Jian-an Period: Take *Zhao Ming Wen Xuan* as the main scope of discussion³

Wen, Kuang-hua⁴

Abstract: The epistolary style, with practicality and beauty, expresses the voice of the literati. The *Zhao Ming Wen Xuan* contains a great amount of letters and plays a pivotal part. The Jian-an period was a special era in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ture, so this thesis mainly discusses the letters included in the "Selected Works" in this era, covering four aspects: the bittersweet emotions about the short-lived life, the vibrant and creative thoughts, the sentence patterns of parallel prose, and the rhetoric of allusions, to examine the poetic style and literary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letter and article. The first two are mainly about the writer's emotions and expressions of literary thoughts, and the latter two are to discuss the work itself, analyzing the poetic features presented in the letter. Through the study of this theme, the literary nature of the letters can be highlighted, and the mood of the writers in the Jian-an period can be appreciated.

Key words: Letters, Jian-an Literature, Poetic Style, *Zhao Ming Wen Xuan*

³ Received: April 22, 2024; Sent out for revision: July 31, 2024; Accepted: August 07, 2024.

⁴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一、前言

書信功能在於人情交際，不但是社會各階層人士傳情達意的書寫媒介，也是文人學士藉以述懷敘心的文書載體，從公牘到私人書牘，「大而文章學問，小而日用細故，無不可言」，⁵應用範圍相當廣泛多元，因此成為古典散文中數量極多，也極具重要性的體類，歷代名篇佳作如林，已蔚成文章大觀。書信本身是極為私人性、個性化的文書，本來通常未必具有公開性的需求，也並無取悅他人之目的，然當書信從偏於交際應酬之應用文書，開始向文學體製風貌趨近，其表達方式、表現形貌以及美感特質自然會有漸變的趨勢。這種變化可能逐漸定型成為一項較為普遍的文體特質，也可能形成一種獨存於某一時代或某些作者的特殊風采，在文學與文體發展史中，是值得關注課題。趙樹功《中國尺牘文學史》指出：「實用性與審美性的高度統一，是尺牘文學的重要特性。」⁶其所述雖未專門針對特定時期，然或可供作考察六朝或聚焦建安時期書體文章的一個值得參考的面向。

漢末至曹魏時期政治社會混亂動盪，但在中國文學史中，卻是相當具有獨特風采的時代，特殊的時代環境與文人個性的交互影響，創作意識的獨立和自覺，使作品不再只是政教目的之附庸，個人情性的表現更受到重視，文章體製也漸發展成熟，因而融匯出一篇篇寄寓慷慨磊落之氣，且異采獨具的作品。

⁵ 引見薛鳳昌：《文體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第三章第五節，頁66。

⁶ 引見趙樹功：《中國尺牘文學史》（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章〈尺牘概說〉，頁21。

據清嚴可均（1762-1843）所輯《全上古三代兩漢三國六朝文》，其中所收錄三國書信約有三百五十五篇，⁷卷帙可謂相當浩繁，範圍也頗為龐雜，且其書性質屬於總集，旨在網羅往代舊作，以拾遺補缺，故所重在文獻價值，故姚振宗（1842-1906）評其書「實為考據之淵藪」，⁸也顯然可見文學性實非其輯錄文章之主要考量。至於《文選》則為周秦至南朝梁代「時更七代，數逾千祀」的詩文選集，就選本的典範性而言，入選者大多屬具有代表性的佳篇，且《文選》以「讚論之綜輯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⁹作為選錄的衡量標準，更可見所選作品風采獨具，在文學美感上也頗能展現「能文」的一面，故多有特出之處，作為書體審美特質考察的憑藉，當更能切實具體。

《文選》為歷代「書」體選精拔萃，於卷四十一至卷四十三，共選錄二十二篇「書」體文章，¹⁰是《文選》三大收錄體類之一，¹¹

⁷ 根據吳璋潔《三國時期書信研究》統計《全上古三代兩漢三國六朝文》中所收錄三國時期書信約計有三百五十五篇。詳參吳璋潔：《三國時期書信研究》（臺南：國立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11年），第一章緒論及附錄一。

⁸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後序〉云：「嚴氏深於目錄考證之學，所輯之書，……後輯《文編》多彙次於其中，雖曰總集，而兼包四部，……集部則佚文皆在，實為考據淵藪。」引見清·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後序〉，收錄於王承略、劉心明主編：《二十五史藝文經籍志考補萃編》（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4冊，頁2251。

⁹ 以上引文見蕭統：《文選·序》。

¹⁰ 《文選》卷四十一至四十三收錄「書」類共二十四篇，然「書」類之末附有「移」文兩篇：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書〉以及孔稚圭〈北山移文〉，名稱和性質均非屬於書體，故實為二十二篇。

¹¹ 如郭殿忱、李紅光〈論《文選》之書體〉一文小節標題云「書信為「《文

其所收錄作品數量，僅次於賦與詩，在「文」性質的各體類中，則屬數量最多者，似可見昭明太子對於書體質量有一定程度的重視。唯為使焦點集中，本論文的考察範圍，主要鎖定在孔融〈論盛孝章書〉以下至應璩〈與從弟君苗君胄書〉等十三篇。¹²此十三篇作家包括孔融（153-208）、陳琳（？-217）、阮瑀（165-212）、吳質（177-230）、曹丕（187-226）、應璩（190-252）、曹植（192-232）等，其中孔融、陳琳、阮瑀為「建安七子」，曹丕、曹植為建安文學領袖，吳質與曹丕、曹植過從較密，為鄴下文人，均明確歸屬於建安時期之代表人物；至於應璩為建安七子應瑒之弟，屬於建安文士，時代也緊密相承，故雖其所作四篇書信可能作於曹魏黃初、太和時期，雖晚於建安，仍連帶列入討論範圍。

「建安」為東漢獻帝年號，相當於西元 196-220 年，但「建安文學」之起迄年代，則未必與此年號起迄一致，說法相當紛紜。¹³

選》第三大文體」，並據以指出：「《文選》共收三十七種文體。從人數、篇數看，詩居榜首，……從篇幅、分量看，賦實為冠，……李少卿、司馬子長等十八人，作書二十四首，無論在人數、篇數，抑或篇幅、分量上，都列占去《文選》大半數量的賦、詩之後而居第三位。」唯其所謂「作書二十四首」，實包括「移」文兩篇，詳上註說明。該文收錄於《昭明文選與中國傳統文化》（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頁 377。

¹² 《文選》「書」體共選錄二十二篇，其中李陵〈答蘇武書〉、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楊惲〈報孫會宗書〉、朱浮〈為幽州牧與彭寵書〉等四篇，歸屬漢代；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介於魏晉之際，一般歸屬於正始時期；孫楚〈為石仲容與孫皓書〉及趙至〈與嵇茂齊書〉兩篇歸屬於晉代；丘遲〈與陳伯之書〉、劉峻〈重答劉秣陵沼書〉兩篇歸屬南朝，扣除以上九篇，不列入本文範圍討論，故實際為十三篇。

¹³ 關於「建安文學」之起迄年代，有多種說法，或以為始於漢靈帝中平元年（184），或以為始於漢獻帝初平三年（192），或以為始於漢獻帝建安元年

綜合各說，「建安文學」所涵括範圍，大致是從漢末建安至曹魏前期（黃初、太和時期），以有別於曹魏後期的正始文學。本論文所選取書體文章論述範圍，亦係採較寬泛意義，以建安文士所作為主，故論文範圍界定為「建安文士」，與「建安時期」以時代為限定有所區分，以避免誤解。

本文旨在考察建安文士書體文章中所展現的詩化風采及審美特質，並選定以《文選》所收錄作品為主要範圍，一方面可有俾於聚焦，使研究取材範圍不至於寬泛；另一方面，也可對書體的名理之常能有更深層的理解，從而對《文選》之選文標準作更貼近的詮解。

二、「書」體美感特質的衍變

劉勰（464-522）《文心雕龍·書記》謂：「聖賢言辭，總為之書，書之為體，主言者也。」又云：「書者，舒也。舒布其言，陳之簡牘。」¹⁴可見「書」具有以筆代言的文學性質，而傳統所指稱的「書」體，大致為廣義之總稱，舉凡上書、簡、帖、札、牘、箋（牋）、啟、移、揭等雜文眾體，¹⁵均涵括其中。依收受對象區分，

（196）；其下限亦有多種說法，或以為至建安二十五年（220），或以為至黃初年間，或以為到魏明帝太和六年（232），亦即曹植卒年為止，以上建安起迄各說詳參王玫：《建安文學接受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8-9。

¹⁴ 引見劉勰著，王更生注譯：《文心雕龍讀本·書記》（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上冊，頁462。

¹⁵ 詳參薛鳳昌：《文體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第三章第五節，頁69-70。

可分為公牘與私牘，前者屬於君臣間應對所使用之公文書，後者則為親朋之間往來的私人書信。明代吳訥（1372-1457）指出：

昔臣僚敷奏，朋舊往復，皆總曰書。近世臣僚上言，名為表奏；惟朋舊之間，則曰書而已。蓋論議知識，人豈能同？苟不具之於書，則安得盡其委屈之意哉？¹⁶

書體本身除「舒布其言」，擔負傳遞訊息載體之一般功能，亦可藉以發揮「論議知識」的交流功能。在體製上，除得依據對象之上下、尊卑、親疏等社交關係，講求立言之得體性，另在「盡其委屈之意」的「盡言」前提與目的下，表達也自然能盡情展現個人情性與風采。《文心雕龍》對於書體創作旨要歸結云：

詳總書體，本在盡言，所以散鬱陶，託風采，故宜條暢以任氣，優柔以憚懷；文明從容，亦心聲之獻酬也。若夫尊貴差序，則肅以節文。¹⁷

書信是所謂「心聲之獻酬」，此處「心聲」本於揚雄「言，心聲也；書，心畫也」之說。¹⁸揚雄以為可由言與書來判別君子小人，此所謂「書」，未必為書信，蓋指較廣義的書面文章，而其所指涉，正是真情實意之表徵，與書信體之基本精神大致相通。於是劉勰延伸揚雄「心聲心畫」之說，來為書釋名章義，即強調書信以信實為本的基本質性。而曹丕〈典論論文〉謂「書論宜理」，可見書

¹⁶ 引見明·吳訥：《文章辨體序說》，《文體序說三種》（臺北：大安出版社，1998年），頁51。

¹⁷ 同注9，頁463。

¹⁸ 《法言·問神》：「彌綸天下之事，記久明遠，著古昔之昏昏，傳千里之恣恣者，莫如書。故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引見漢·揚雄撰、韓敬注：《法言注·問神卷第五》（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頁110。

體所需講究的名理之常，原本並不以情及美為優先的關鍵要素，然而書體遵循「條暢」、「優柔」之創作原則來「任氣」、「懌懷」，則可充分揭舉「心聲」中可能具有的抒情質素。柯慶明對上述所引《文心雕龍》之論闡釋云：

強調的還是抒情述懷的本質，加上了獻文酬答的語境，以及因為發訊者與受訊者之間，除了同輩的友朋之外，往往有「尊貴差序」的情勢，則不免要合以禮儀甚至利害的考量，而要「肅以節文」，在修辭策略與表現上有所調整。以及「託風采」、「優柔」、「文明從容」等既是性情也是文藝上的優美。¹⁹

是故書體在「心聲獻酬」的本質上，也同時朝「文明從容」之審美傾向發展，從務真進而重情、求美，逐漸重視文藝美感的這一遷變軌跡，也當是考察書體文章之一項重點。就魏晉南北朝來看，馬自力指出：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書牘文，不僅在數量上比前代明顯增多；而且內容也有較大的擴充，更富於文采。從此，書牘文成了一種重要的文學體裁。²⁰

褚斌杰認為此時期書牘文不僅內容大為擴大，藝術色彩也大為增強，並謂：

書信也就不單純是一種社會必需的應用文體，而成為一種文學創作，成為文學之林的一種具有獨立地位的文學樣

¹⁹ 引見柯慶明：〈「書」「箋」作為文學類型之美感特質〉，《古典中國實用文類美學》（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年），頁94。

²⁰ 引見馬自力：《餘霞散成綺——古代散文創作》（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頁39。

式。……魏晉時代，文章還上承兩漢遺風，書牘文寫得還比較莊重，但也已注重詞藻，……也十分注重情致，往往有一股至性深情蘊藉其間，能做到楚楚動人。²¹

可見魏晉書牘重視文采及情致之創作趨向，已為重要體製特點。趙樹功更指出曹魏書信內容及書寫手法上可見到的漸變現象：

由質樸向華麗過渡，漢初已露端倪，至曹魏已漸成風氣。有的作品中，已出現了大段的與昔日表情、說話有別的有意鋪陳與描繪，華麗虛飾的東西漸多，繞的圈子漸多，藻繪雕琢漸多。……尺牘往往以虛寫實或乾脆以虛寫虛，已屬有意識的創作。尺牘的文體意識更加強化、鮮明。²²

此說更聚焦在曹魏此一時期的文人書體風采，作品質量在大幅進展的同時，也更有意識進行創作，故鋪陳、描繪、雕琢的成分更顯著，文體意識鮮明，展現出與兩漢時期不同風貌，故值得留意。

錢穆（1895-1990）嘗論及魏晉散文特點，從「內情」及「外貌」概括謂：

魏晉人乃是開始以日常人生與其私人情感作題材，為此以前經、史、子部著作所少見。若論魏晉文之外貌，又可說有兩個特殊點：一是語體文言之創興，一是散文之詩化。²³

指出魏晉時期在發展獨立存在價值、有意為文的背景下，將日常生活及私人情感等本慣用於為詩的題材，轉化用於散文之寫作，因而

²¹ 引見褚斌杰：《中國古代文體概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頁404。

²² 引見趙樹功：《中國尺牘文學史》，第2章〈從尺牘私人化的完成到第一個高峰〉，頁109。

²³ 引見錢穆：〈魏晉文學〉，《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三）》（臺北：聯經出版社，1998年），頁233。

明顯產生「語體化」及「詩化」的特點。其所謂「語體化」指的是力求自然，心口如一，故語意平鋪直敘；至於「詩化」是指語句較短，多用四言形式。此兩項特點互相結合，則易使散文呈現一種與兩漢、唐宋古文有別的文體風貌。此體並非純然時興之駢儷，卻似賦體，「因其直率將私人情感平白率直寫出，情話如一，而成為此一新時代之新文學。」²⁴錢先生並又進一步指出：

當代詩化散文中，最傑出、最躋上乘者，莫過於「書牘」一體。²⁵

此說從時代背景進行考察，歸結文章體製發展之實際現象，頗為可取之論，也正可作為本文觀察探究的起始點。建安文士多屬詩歌藝術造詣相當高的詩人，因此在為文之際，也就很自然將詩的技巧、情趣和意境等融入揮灑於辭章之中，並習慣運用詩性的思維與語言，因而造就出不同的文章體勢。

故本論文所指涉「詩化風采」之概念，除錢穆所謂「語句較短」、「多用四言」屬於詩體製的形式特徵外，也意謂文士在「散鬱陶」、「託風采」之際，將詩意融入灌注，因而在思維、情趣和語言上，亦能具有些許「詩化」現象，或多或少呈現類似於詩的風采和美感。但畢竟文章並不同於詩，也並非在為文時運用詩的體式和韻律，而是詩文兩體部分特質的交涉、互動與結合。是故可以更進一步探問：詩的風采與情趣如何透過文章來呈現？建安文士諸篇書體文章中，體製上如何呈現詩化的文學美感？文章的詩化美感與作品情思內涵如何發揮相輔相成的效果，以成就佳作？凡此仍有再據以延伸探論之必要。

²⁴ 同上註，頁 241。

²⁵ 同上註，頁 243。

《文選》選錄歷代各家書體之文，學者以為其具有「排沙簡金，選精拔萃」以及推動書信體散文發展的作用。²⁶「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雖是《文選》各體作品的文學通性，然就書信體的文學個性與別性而言，與其他應用文書相較，明顯為「心聲心畫」的表徵，故作者在「散鬱陶」之際，亦能造就作品「出於沈思」的一面；至於書信「託風采」、「條暢以任氣，優柔以懌懷」、「文明從容」等特質，雖彰顯了「歸乎翰藻」的文采面貌，然書信所散發出獨特而自在的抒情質素與才性，確實也造就風采獨具的佳篇，使書信體在散文史上佔有一席之地。是故本文從書體詩化風采的角度切入，正是對書信進行文學美感特質探索的一個嘗試，亦期能從中展現書體更多層面的文學內涵與價值。以下進一步針對書體辭章的幾個面向著眼，展開探究，期能呈顯其詩化風采。

三、憂生傷逝之情懷

書信所以成為文學之重要體類，就在其不僅發揮社會交際、傳遞訊息的應酬功能，另也如創作一般，以「心聲之獻酬」為創作旨趣，盡心從事，正所謂「尺牘書疏，千里面目也」，²⁷即使遠隔千里，亦如在目前，在信中寄託真情實感與性格風采。「事出於沈思」，意謂作品應蘊含作者真切的書寫動機與用心，這對於「心聲之獻酬」的書信而言更可謂如此。尤其漢末建安時期文風，如《文

²⁶ 詳參郭殿忱、李紅光：〈論文選之書體〉，收錄於《昭明文選與中國傳統文化》（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頁377-388。

²⁷ 此為顏之推：《顏氏家訓·雜藝第十九》所引江南諺語，引見北齊·顏之推撰，王利器注：《顏氏家訓集解·雜藝第十九》（臺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3年），頁507。

心雕龍·時序》所評：「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作品正是富有「建安風骨」精神的時期，因此親友故舊之間，在書信中放言敘心，無所拘忌，或慷慨以表意，或磊落以抒懷，其「志深筆長」之抒情特點尤為昭顯。這一重情的寫作傾向，與文章詩化特徵的形成，當有連帶關係。尤其在「世積亂離，風衰俗怨」的動盪社會與時代，文士多情善感的心靈，在生命意識上往往有更深刻的探尋與關懷，也因而在生離死別之際，對於自身生命的有限與存在更容易抱持不確定感，具體而言，這種不確定感是一種人生短促、聚少離多、悲多樂少的境況所引發出的傷感。李澤厚（1930-2021）指出：

對生死存亡的重視、哀傷，對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嘆，從建安直到晉宋，從中下層到皇家貴族，在相當一段時間中和空間內瀰漫開來，成為整個時代的典型基調。²⁸

魏晉時文人感慨人生如朝露、人生易逝的憂患情懷，除了屢屢見諸詩歌作品，²⁹詩人也很自然會透過書信與好友表達，因此書信就成為將深切的人生感懷加以審視、記錄以至於分享的媒介，也普遍成為共通的文學主題。如孔融作書薦舉盛憲（字孝章），期曹操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出手援救身處危殆的盛孝章，然在〈論盛孝章書〉文章開頭便流露歲月易逝、故舊凋零的感慨之情：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融

²⁸ 引見李澤厚：《美學三書·美的歷程》（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年），頁92。

²⁹ 具體作品如：「天地無終極，人生如朝霜」（曹操〈送應氏〉）、「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短歌行〉）、「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曹植〈贈白馬王彪〉）、「人壽幾何，逝如朝霜」（陸機〈短歌行〉）等，感懷之情思相近。

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有會稽盛孝章尚存。³⁰

此處用詩化、³¹抒情筆調開篇引入，這感懷之筆，既具有對歲月飄忽、知交零落的滄桑情懷，也成為動之以情的一種書寫策略。

曹丕〈與朝歌令吳質書〉，是寫給好友吳質的信，在信中除敘別後思念之外，也回憶往昔鄴下文士南皮之遊「高談娛心」的難忘情景，酒興詩情之餘，不免在「節同時異，物是人非」的心境下，同時觸及了生死哀樂之傷感：

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余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為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為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文選注》，卷42，頁602）

其「樂往悲來」的關鍵，當由於好友阮瑀長逝，因而引發了悼亡、傷逝的情思，書信最後「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則更順勢襯托出難以言說的孤寂之感。曹丕〈與吳質書〉（或稱〈又與吳質書〉）寫在前引〈與朝歌令吳質書〉之後三年，³²面對「魏大疫，諸人多死」³³的疾疫，由憶舊轉而傷今，並深致傷悼之情，當是

³⁰ 引見唐·李善：《文選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91年），卷41，頁594。以下原文凡引《文選注》者，皆直接括注於引文之後，不另加註。

³¹ 如錢穆此文指出：「此乃把古詩四字句法運化為散文，成為一節詩化之敘事散文。」引見錢穆：〈魏晉文學〉，《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三）》，頁241。

³² 此參據陸侃如《中古文學繫年》之考證，〈與朝歌令吳質書〉寫於建安二十年（西元215年），「魏大疫，諸人多死」依李善《文選注》引《典略》記載為建安二十二年，〈又與吳質書〉寫於建安二十三年（218年）。詳參陸侃如：《中古文學繫年》（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下冊，頁398-418。

³³ 語見李善《文選注》引《典略》之語，《文選注》，卷42，頁602。

《文選》所收建安書信中抒情色彩最為顯著的一篇，³⁴文云：

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冀壤，可復道哉！（《文選注》，卷42，頁603）

信中悼念亡友往事，緬懷昔日宴遊賦詩盛況，豈料轉眼數年之間，昔日歡聚飲宴景象不再，為了留下紀念，於是匯集亡友遺文，故在「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而此諸子，化為冀壤」以及「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投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等多重傷感之下，睹其文思其人，透過昔盛今衰的對比，蘊含生命短促、世事無常的憂生之嗟。是故篇末又云：

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暝，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恐永不復得為昔日游也。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炳燭夜遊，良有以也。

此則感嘆年華易逝，意志更已不復以往，「恐永不復得為昔日游」更加深對昔日宴遊之樂已難再得的感傷。駱鴻凱（1892-1955）評此文謂：

子桓文便娟宛約，頗極徘徊往復之情，……爾則子桓之才，雖富文藻，而遭會所逢，尤多感慨。宜其俯仰歎歎，一往情

³⁴ 如趙俊玲〈論《文選》所收建安時期書信〉一文指出：「《文選》所收建安書信，最富感情的大概要屬曹丕的〈與吳質書〉。」文收錄於《西南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8卷第3期（2007年06月），頁72。

深也。³⁵

此即特別凸顯其文迴環往復、用情至深的一面。柯慶明指出此篇在文學品鑑以外的獨特意義，謂：「使這篇〈書〉成為文學上的名作，卻是來自對於命運之無常的覺知與生命飄忽短暫，終歸於盡的哀感。」³⁶此處所凸顯的「哀感」，自是書信感動人心之處，也是抒情美感的一種表現。「哀時言志」漸成為建安時期文士詩文的嶄新題材，³⁷而悲情哀感與審美感受的結合，則形成以悲為美的美學價值取向。

自然之代謝，世事之無常，確實是人所共感，卻又最難以釋懷的心情，故文人自然而然以書信為媒介分享心聲。如應璩〈與侍郎曹長思書〉在給友人曹肇（字長思）（?-244）信中，在文中藉「薄援助者，不能追參於高妙，復斂翼於故枝，塊然獨處，有離群之志」的人生處境，以抒發懷才不遇、鬱不得志之情，文末則「陳其苦懷」謂：

夫皮朽者毛落，川涸者魚逝，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數，豈有恨哉！聊為大弟陳其苦懷耳。（《文選注》，卷42，頁609-610）

所有人事均難擺脫自然，而自然之數難以強求，故歸結以順應自然為念，互為慰藉，除表達超然豁達的心境，其中也蘊含難以言表的深重情思。

³⁵ 引見駱鴻凱：《文選學·附補編·文選分體研究舉例》（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頁495-496。

³⁶ 引見柯慶明：〈「書」「箋」作為文學類型之美感特質〉，《古典中國實用文類美學》，頁135。

³⁷ 詳參朱雅琪：《魏晉詩歌中的審美意識》（臺北：花木蘭出版社，2007年），上冊，頁70。

追懷昔日之際進而感傷逝者、悼念亡友顯然為此時期詩文情思表現的一大主題取向，其透顯了生命深層的「傷逝」情結，此種情結及心聲透過書信這一媒介傳達，尤顯得志深筆長，故也成為感物緣情的文學表現主題。〈文賦〉謂：「詩緣情而綺靡」，標舉「緣情」為詩歌的體類特質，如陳昌明所謂：

「緣情」觀念不僅限於詩，乃是影響及文學的各種類型，而「緣情」觀念所代表的精神，實與時代新思潮脈動相通。³⁸

漢代「言志」主言意尚用，重在倫理判斷，六朝「緣情」所探討的是「情」，則開美感意識之途徑。³⁹

個人情感漸能從傳統載道言志意義的脈絡中獨立，文人用詩性的眼光看待世界，文學作品更有追求美感的動機及個人主體意識的可能性，書信之體也不僅限制於原本的應酬表意功能，而具有更強的抒情性，故順勢成為抒發心靈深層悲歌的載體。建安時代的特殊性造就文學作品的特殊風貌，陳洪對此「詩化人生」之形成脈絡因素謂：

他們大多有著從亂離走向安定的人生經歷，有著從書齋走向沙場的人生軌跡，有著悲涼、激越而又放縱、安樂的感情，有著輕理性而重感性（輕名重實）的思想。這些因素都很好地造就了他們的詩人氣質和慷慨的歌喉，形成了非功利、主緣情、重個性和求華美的創作傾向。反過來說，詩就是他們生命痕跡的真實體現，也是構成他們詩化人生的重要組成部

³⁸ 引見陳昌明：《緣情文學觀》（臺北：臺灣書店，1999年），序說，頁2-3。

³⁹ 引見陳昌明：《緣情文學觀》，第三章，頁91。

分。⁴⁰

此處所指涉雖以詩為主，然而當時文士「悲涼激越」的感情、「輕理性重感性」的思想、「詩人氣質」、「慷慨的歌喉」、「主緣情、重個性和求華美」的創作思維，表現出詩化人生的具體內涵，同時也體現了建安時期「志深而筆長」的文學風尚，此風亦沾溉波及代表文人心聲的書牘之體，為以重情為主要傾向之書牘文章增添了詩化風采。

四、縱橫馳騁之文思

除了沉鬱的傷逝情懷，作家本身激揚熱切的生命力，也在與好友酣飲暢敘的宴席上具體展現，作家風采與記憶透過書信的文字記載，盡興揮灑，呈現慷慨瀟灑的一個側面，正如《文心雕龍·時序》所描述：「傲雅觴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談笑」，或為壯懷之情，或為傲世之志，其文思縱橫馳騁，時代情景不同，文體風貌也呈現了不凡的異采。從散文發展史角度來看建安時期散文整體特點及時代風貌特徵之形成，如學者謂：

魏晉的散文革新，前後有用世與處世的不同，有慷慨與憂鬱的區別，但共同的特徵是有獨立的人生價值的追求，有個體生命意識的自覺，無論說理敘事，都能抒發情志。⁴¹

建安散文的通脫任氣，本質上是一種人生精神的表露，是作

⁴⁰ 引見陳洪：《詩化人生——魏晉風度的魅力》（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103-104。

⁴¹ 引見劉衍主編：《中國散文史綱》（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古代卷〉，第四編第九章，頁135。

家品性和文章品性的融合。其中，作家的不矯情造就了文風的率真和氣勢，與時代的氛圍相碰撞之後，形成了建安散文的總體特徵。⁴²

在文學自覺意識下，作家抒發情志，展現更多元的人生價值，富有積極進取的人世精神，從而揮灑出率性、任氣、通脫的作品風格。魯迅曾對漢末魏初文章概括具有「清峻通脫」之特點，所謂「清峻」是指簡約嚴明，「通脫」則大致是放言無所顧忌，想寫便寫的寫作態度，⁴³性情一任自然，思想不受束縛，因而創作時，文思更得以任情馳騁，既透顯作家本色，也在苦悶時代中漸能展現浪漫的詩人情懷，故可謂為一項重要的文風趨勢。

在書信中，藉心聲酬答時機，談文論學，分享自己文學見解，大致可謂是常見之例，也並無時代文風之別；然而作者放言高論時所展現率性、無所拘忌的情懷，或可作為「通脫」文風的表徵。先以曹植〈與楊德祖書〉一文為例，這篇是曹植寫給知己楊修（175-219）的書信，除根據自身創作體會，表述諸多文學批評見解，並暢談自己的人生志向，是書信中的名篇，大致寫於建安二十一年，曹植時年二十五歲。⁴⁴文中論及建安文人，評論云：「此數子猶復不

⁴² 引見阮忠：〈建安散文的文風走向及三曹等人的散文藝術〉，收錄於熊禮匯主編，《中國古代散文藝術二十四講》（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七講，頁118。

⁴³ 詳說參見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而已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頁98-100。

⁴⁴ 文中有云：「僕少小好為文章，迄至於今，二十有五年矣」，並依據陸侃如《中古文學繫年》之考證，〈與楊德祖書〉當寫於建安二十一年（西元216年）。詳參陸侃如：《中古文學繫年》（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下冊，頁403-404。

能飛軒絕跡，一舉千里。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為狗也」，對文人如陳琳（孔璋）之輩無自知之明的現象，提出尖銳批評；關於創作者素養及必要條件，指出「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其淑媛；有龍泉之利，乃可以議其斷割」，凡此類觀點或許輕狂，也仍存在討論空間，然其與好友高談闊論，立論態度大膽，且均成為文學名言，也透顯了「心聲之獻酬」的書信特質。至於書信末尾陳述個人人生志向，其謂：

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吾雖德薄，位為蕃侯，猶庶幾勳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文選注》，卷 42，頁 605）

此陳述自我期許不限於「辭賦小道」，而以建功立業為首要之志，退求其次方為「成一家之言」，「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兩句，其雄偉志向鏗鏘有力，「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哉」則又頗顯得自傲自負。文章放開心胸直敘己志，率直又不矯情，確實展現盛年壯志在懷、意氣風發的一面。因而《駢體文鈔》總評此文曰：「有波瀾，有性情。」⁴⁵另高步瀛（1873-1940）評謂：「論文語意切摯，真甘苦自得之言。後幅傾吐懷抱，不欲以文人自囿，尤覺英氣逼人。」⁴⁶可見曹植人生前期鮮明的抒情風采，而「英氣逼人」正可視為「通脫」態度的展現。

另外，建安文士書信也常反映日常的遊宴生活。文人作家多酣

⁴⁵ 此評引見清·李兆洛：《駢體文鈔·箋牘類》（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萬有文庫第二集，卷 30，頁 607。

⁴⁶ 引見高步瀛：《魏晉文學要》（北京：中華書局，1989），頁 43。

飲暢敘的宴席上「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談笑」，藉酒興揮灑想像力，以期暫時排解現實中各種難以言說的深沉情思或人生苦悶，故所作書信中所展露文思多超越現實，從中更能顯現馳騁跳躍的想像思維及詩性風采。趙俊玲指出：「描寫遊宴生活、談論文學及抒發對建功立業的抱負，詞采藻美，亦是《文選》所選曹丕、曹植寫給吳質書信的共同特徵。」⁴⁷可見有關遊宴題材的敘寫，當為《文選》所選書信中的一項特點。如曹植〈與吳季重書〉回憶簫笳齊鳴、縱情歡樂的宴會情景，頌揚吳質盡情敞懷之際所展現灑脫不凡的氣度與壯志：

若夫觴酌凌波於前，簫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歎虎視，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眄，謂若無人，豈非吾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當斯之時，願舉太山以為肉，傾東海以為酒，伐雲夢之竹以為笛，斬泗濱之梓以為箏，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文選注》，卷42，頁606）

信中以「鷹揚」、「鳳歎」、「虎視」等形象表現吳質文韜武略，傲視群雄之壯志豪情，而「舉太山以為肉」、「傾東海以為酒」、「伐雲夢之竹以為笛」、「斬泗濱之梓以為箏」以及「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等，則超越現實情境，充分展現大丈夫宴飲盡歡之人生快意，句式排疊如奔洩而下，極力馳騁異想天開、誇張綺麗之文思，從中也顯露作者激昂的豪氣及鋒芒。高步瀛曾評曹植〈與吳季重書〉謂：「魏晉之文，淵雅有餘，而氣勢多不振。子建特為雄駿，此篇

⁴⁷ 引見趙俊玲：〈《文心雕龍》與《文選》書信觀辨析〉，《聊城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3期（2016年06月），頁37。

尤覺光燄非常。」⁴⁸其能予人「雄駿」、「光燄非常」之氣勢，當是綺麗文思縱橫馳騁的一種展現，其誇飾的效果，正如黃永武所謂「寫往日縱情歡樂的情景，若不加誇飾，則意不暢而情不顯」⁴⁹。然而吳質〈答東阿王書〉針對曹植此信所述，除了以「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之綢繆乎」，盛讚其文思與才情，並酬答云：

若追前宴，謂之未究，傾海為酒，并山為肴，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若質之志，實在所天。思投印釋鞬，朝夕侍坐，鑽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對清醕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使西施出帷，嫫母侍側，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文選注》，卷 42，頁 607）

若乃近者之觀，實盪鄙心。秦箏發微，二八迭奏。塤簫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座右。耳嘈嘈於無聞，情踴躍於鞍馬。謂可北懾肅慎，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又況權備，夫何足視乎！（《文選注》，卷 42，頁 608）

前一段先以己志與曹植迴別作為回應，云「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面對美酒嘉餚，難以盡情享受，也無此奢望，只能謹守盛德之道，以求明哲保身，與曹植之情懷相比，則刻意展現出個人志趣謙卑而又壓抑的一面。⁵⁰ 後一段則旨在追憶前宴景象，描

⁴⁸ 引見高步瀛：《魏晉文舉要》，頁 48。

⁴⁹ 引見黃永武：《字句鍛鍊法》（臺北：洪範書店，1986年），頁 91。

⁵⁰ 曹植〈與吳季重書〉與吳質〈答東阿王書〉這兩篇約寫於建安二十年或二十一年，前者顯露激昂的豪氣及鋒芒，後者則顯得謙卑壓抑，表面上是展現了不同志趣，然吳質此時正周旋在曹丕、曹植兄弟鬥爭之間，既為曹丕出謀劃策，也未與曹植交惡，然文雖有性情，但心結難免，故文中自有浮飾虛語，

敘秦箏獻美聲、女樂奏妙曲、塤簫靈鼓蕩漾又震響的樂音享受，人不僅為之心神蕩漾，其聲威甚至可震懾肅慎及百越，則又明顯為行文誇飾之筆，大幅超越現實，除了是躍躍欲試、欲進取有為的情志表徵，也充分展現了其慷慨縱橫、恣意率性的文思。

至於應璩〈與滿公琰書〉一文，是應璩因滿炳（字公琰）過訪，欲遺書致謝，滿炳又召請，應璩因「適有事務，須自經營」，故作書回覆。文雖出於應酬，但其中書寫與友人聚會情景，筆下也充滿飛躍之文思，情致盎然，如云：

昨者不遺，猥見照臨，雖昔侯生納顧於夷門，毛公受眷於逆旅，無以過也。外嘉郎君謙下之德，內幸頑才見誠知己，歡欣踴躍，情有無量。是以奔聘御僕，宣命周求，陽書喻於詹何，楊倩說於范武。故使鮮魚出於潛淵，芳旨發自幽巷，繁俎綺錯，羽爵飛騰，牙曠高徽，義渠哀激。當此之時，仲孺不辭同產之服，孟公不顧尚書之期。徒恨宴樂始酣，白日傾夕，驪駒就駕，意不宣展，追惟耿介，迄于明發。（《文選注》，卷42，頁608-609）

開頭為客套應酬之筆，展現公琰來訪，自己懷抱款待知遇之情意，其引用「侯生」、「毛公」之典以凸顯自己「歡欣踴躍，情有無量」情意之深切；其後，「奔聘御僕，宣命周求」寫張羅備宴之殷勤，「鮮魚出於潛淵」兩句寫菜餚之豐盛，「繁俎綺錯，羽爵飛騰」寫

如于光華《評註昭明文選》引錄多則文家評語，如：「孫月峰曰：『陳思與季重，原非真相知，故兩書類多浮飾語。』」、「孫曰：『辭雖華，大約失之浮』」，可見行文亦隱有針鋒相對之意，唯此與本論文主題直接關聯不高，故列此備參，不另展開闡述詳究。以上評語引見清·于光華：《評註昭明文選》（上海：掃葉山房，1923年），卷十，頁24。

宴席賓主盡歡之熱絡，「白日傾夕，驪駒就駕」則寫宴飲歡樂時光之飛逝，一路鋪敘而下，再穿插幾則相關人事典故，其情景描寫綺麗，文意承轉流利，實中有虛，頗富含詩化散文之韻味。是故趙樹功《中國尺牘文學史》認為此文「已有意識地開始作景物描寫」，並讚譽謂「典雅、豐碩、婆娑有致，是閑文中的佳品」。⁵¹

在「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談笑」的飲宴情境下，文士激揚熱切的情思，在淋漓酣暢的文字描寫下靈活生動，文士在這些筆墨所呈現的形象，也不只是作家，其實更像是情思躍動、想像豐富的詩人。

五、駢辭儷偶之句式

本節從作品本體來看，當文章遣辭造句多用儷偶，則句式之經營即有似於以詩為文，其駢儷的語言及節奏，使表達更顯得工整凝鍊，文章體勢因而具有詩化特徵。故前人所謂「以詩為文，六朝儷偶之文也」，⁵²其意正在呈顯駢體文章所呈現的詩化現象。陳必祥指出魏晉南北朝時期書信「寫得詞采雋永，音節鏗鏘，語言富於音樂性。」⁵³散體文章卻富有鏗鏘的音樂性，大致與駢儷句式有直接關係。

⁵¹ 引見趙樹功：《中國尺牘文學史》，第1章〈尺牘概說〉，頁125-126。

⁵² 引見清·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卷二，頁17。

⁵³ 引見陳必祥：《古代散文文體概論》（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頁147。

(一) 從四六言句式的運用來看

書信之體「本在盡言」，語句隨表達需要，短長不拘，但由於四言句式簡單但表述可達完整，組成形式上又不若三言般迫促，不僅以《詩經》為代表的四言詩歌獨具風采，散文也相當廣泛運用，與六言句式兼用，均為雙數字句型，利於偶對，故也易於進一步形成駢儷文章兼用四六句型的行文特徵。關於文章句式運用，《文鏡秘府論》謂：

句長聲彌緩，句短聲彌促，施於文筆，須參用焉。……至於四言，最為平正，詞章之內，在用宜多，凡所結言，必據之為述。……細而推之，開發端緒，寫送文勢，則六言、七言之功也；泛敘事由，平調聲律，四言、五言之能也。⁵⁴

長短句兼用是文章普遍形態，尤其四言句式「最為平正」，宜敘事宜結言，故用途易廣，六言句式再多添一個音節，意義之表述更能充分，用於寄深寫送，也更顯靈活。劉勰曾謂「四字密而不促，六字裕而非緩」（《文心雕龍·章句》），正是著眼於四言句式密促適中、六言句式裕而不緩的運用特點。四言屬於短句，簡約流暢，步調輕快，且精鍊如詩，在駢儷一路鋪排下，適時搭配六言句式，即易形成句式規律，頗具詩化風采。

四六言句式可以廣泛運用在敘事、寫景、說理及抒情之文，在文章中依表達之需求兼用，並形成不同效果。先就敘事、寫景方面來看，如曹丕〈與朝歌令吳質書〉：

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

⁵⁴ 引見（日）弘法大師撰，王利器校注：《文鏡秘府論校注·南卷·定位》（臺北：貫雅文化事業，1991年），頁406-407。

碁閒設，終以六博，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竝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參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余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為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為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文選注》，卷42，頁602）

此處前半追憶舊日朋友歡聚宴遊、讀經論子、設局彈棋、鳴箏豪飲等景況，以及浮瓜沈李、同乘夜遊等樂事，行文除穿插一組六言句之外，其餘均以四言句式為主，筆墨簡約，節奏輕快，娓娓敘來，頗為自然灑脫，感懷之餘，也充分展現愉悅之情致。後半從「輿輪徐動，參從無聲」以下，則轉為「樂往哀來」的淒冷情緒，雖仍連用四字句，但語調更顯舒緩，其「舒緩語氣裡的深情灌注，都帶給人很多的感動。」⁵⁵錢穆此文分析指出：

此書只說宴遊之樂，而微帶感傷之情。論其內容，只是敘述日常人生之一片段，敘述內心情志之一剎那，殊無瑰偉絕特之處。然隔近兩千年，至今誦之，依然親切，情景如昨，嘅嘆可聞。文章不朽，如是如是。若論其技巧，也只是運用四字句，化詩為文，平鋪直敘，僅如一篇小賦。⁵⁶

其情致出於生活，出於深情，所書寫情景歷歷在目，而四言句平鋪直敘而下，「化詩為文」的筆調，尤具詩化風采。清蔣士銓（1725-

⁵⁵ 此引見阮忠：〈建安散文的文風走向及三曹等人的散文藝術〉，收錄於熊禮匯主編：《中國古代散文藝術二十四講》（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七講，頁125。

⁵⁶ 引見錢穆：〈魏晉文學〉，《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三）》，頁243。

1785) 曾評此文云：「氣體閒逸，風韻盎然」，⁵⁷可見其詩化的言說方式，具有感染力，也可有助於閒逸舒緩風韻之表達。又如應璩〈與從弟君苗君胄書〉一文，主旨在表達自己嚮往歸隱田居之願，以期勸阻兩弟勿因貪圖榮寵而出仕，其中也流露追尋自我人生意義的意識。文章開篇極寫北遊欣悅之情，描摹自然景致，頗具詩情畫意，其云：

閒者北遊，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矇。風伯掃途，雨師灑道，按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接武茅茨，涼過大夏；扶寸肴脩，味踰方丈。逍遙陂塘之上，吟詠菀柳之下，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以翳日，弋下高雲之鳥，餌出深淵之魚，蒲且讚善，便嬛稱妙，何其樂哉！

（《文選注》，卷42，頁610）

心境閒適輕鬆，視野也隨之開闊，於是酌飲春酒，放情於山林田野，逍遙吟詠，結芳折枝，弋射垂釣，此處行文前半連續使用四言句，再連用三組成偶對的六言句，其四六兼綜並用，一路暢敘而下，洋溢著無比自在舒暢的心情，足見其樂無窮；文末則展現歸田之願：

幸賴先君之靈，免負擔之勤，追蹤丈人，畜雞種黍，潛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為可矣。無或遊言，以增邑邑。郊牧之田，宜以為意，廣開土宇，吾將老焉。劉杜二生，想數往來。朱明之期，已復至矣。（《文選注》，卷42，頁610）

此處表明自己將潛心讀書，終老田園之願，全段幾乎皆用四言句，正透顯其堅定心志，且讀來相當簡鍊明淨。

其次，在說理方面，從阮瑀〈為曹公作書與孫權〉一文來看，

⁵⁷ 此評引見高步瀛：《魏晉文舉要》（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頁6。

此文是阮瑀為曹操代筆，引經據典，並透過援引大量史實，從各項形勢分析利害關係，以破壞孫劉聯盟之勢，期望孫權勿因聽信讒佞之言，用來籠絡孫權，茲節錄兩段引文加以說明：

昔赤壁之役，遭離疫氣，燒舡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荊土本非己分，我盡與君，冀取其餘，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也。思計此變，無傷於孤，何必自遂於此，不復還之。高帝設爵以延田橫，光武指河而誓朱鮪，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是以至情，願聞德音。（《文選注》，卷42，頁600）

然道路既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為。且又百姓國家之有，加懷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昭副，不勞而定，於孤益貴。是故按兵守次，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願仁君及孤虛心回意，以應詩人補袞之歎，而慎周易牽復之義。濯鱗清流，飛翼天衢，良時在茲，勗之而已。（《文選注》，卷42，頁602）

前例運用勸說策略，從赤壁之役因遭疫而避退，江陵之守因物資耗竭而還師，荊州之地也已主動讓與，充分展現主動誠意，動之以「至情」，希望能獲得孫權善意回應。後例為書信末尾，以不幸災樂禍，不輕信降者之言，表現親善修好之意，願孫權能回心轉意，又由《周易》「牽復」之義，以喻牽引指點回歸正道，申明規勸之旨，最後「濯鱗清流，飛翼天衢」則以頗富詩意的語言勸勉收結，表明此時正是海闊天空、展翅遨翔的佳期。以上兩段落主要為散體，其中句式長短間雜，然四言句式所佔比例頗高，使勸說策略明快，語調不卑不亢，義理推展順當，讀來感染力強，發揮極強說服

力量。曹丕〈與吳質書〉曾評調：「元瑜書記翩翩」，即凸顯阮瑀書牘奏記之文，文采飛揚，甚有動人風致。

再者，從抒情方面來看，書信中也常用抒情之筆以表達應酬之意，如曹植〈與吳季重書〉：

然日不我與，曜靈急節，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闕。思欲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天路高邈，良久無緣。懷戀反側，如何如何！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曄若春榮，瀏若清風，申詠反覆，曠若復面。（《文選注》，卷42，頁606）

此處前半慨歎時光飛逝，會面時間短促，別後如參商二星難有相會之期，故出奇思妙想，想要扼住六龍之頭，制止羲和韁繩，折斷若木阻擋太陽，關閉濛汜谷口，以使時光暫留，但思懷依戀之情，仍令人輾轉反側，此數語鋪排而下，極盡誇張，雖出於應酬，但也可見兩人知音相得之情；後半「得所來訊」以下，則為應對酬答之語，讚美吳質書信文采斐然，盛開如春花，流暢如清風，以具體形象為喻，富含詩意，頗可顯見曹植「詞采華茂」⁵⁸的一面。在句式的運用上，整段行文以四言句式較多，其間兼用五言、六言，並明顯呈現駢儷工整的辭句特點。

另舉一例，如吳質〈答東阿王書〉書信末尾：

還治諷采所著，觀省英瑋，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也，眾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鄭，七子賦詩，春秋載列，以為美談。質小人也，無以承命。又所答貺，辭醜義陋，申之再

⁵⁸ 鍾嶸《詩品》評曹植云：「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詳參梁·鍾嶸著、陳延傑注：《詩品注》（臺北：里仁書局，1992年），頁20。

三，赧然汗下。此邦之人，閑習辭賦，三事大夫，莫不諷誦，何但小吏之有乎！重惠苦言，訓以政事，惻隱之恩，形乎文墨。墨子迴車，而質四年，雖無德與民，式歌且舞。儒墨不同，固以久矣。然一旅之眾，不足以揚名，步武之間，不足以騁跡。若不改轍易御，將何以效其力哉！今處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責以千里之任；檻猿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者也。（《文選注》，卷42，頁608）

吳質在此一方面讚美曹植文思才情之美，推崇為「賦頌之宗」、「作者之師」，一方面以「辭醜義陋」來自謙文章拙劣，並且因侷促朝歌一地，有志難申，不足以揚名騁跡，故表達希望能「改轍易御」以「效其力」的期願，在應和酬答之際，也兼有抒寫懷抱、暢敘心聲之意。其行文除少數為五、七言，大多屬於四言句式，讀來亦有詩化的節奏及規律；尤其最後以「絆良驥之足，而責以千里之任；檻猿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之對偶儷句，以形象喻示自己正面臨困窘的人生處境，因而自怨自艾，流露抱負難以舒展的鬱悶及酸楚的心情，其造語整練，意蘊綺巧，頗具獨特性。

（二）從駢儷句式之比例來看

散體中適時運用駢儷句式，可使文意更顯整練，而大規模連用，則不僅構成駢儷之體，也能有裨於形成較為嚴整的句式規律，文章的音樂性及詩性特徵也於此可見。劉師培（1884-1919）曾指出：

建安之世，七子繼興，偶有撰著，悉以排偶易單行，即非有韻之文，亦用偶文之體，而華靡之作，遂開四六之先，而文

體復殊於東漢。⁵⁹

由此可見建安時期散體文章中運用排偶，已開四六風氣之先，對於文體發展有關鍵性，對於縟麗文風亦產生重要影響。鍾濤也認為駢儷文的形式特點在魏代散文中更有為深入、全面、廣泛運用的現象，指出：

魏代的書牘文在對偶、藻繪、用典幾方面比較於其他文體都典型得多。……對偶與用典這樣普遍、大量地出現在每一篇文章中，確實標明魏代文章和先秦兩漢文的不同。……對偶的精工和多樣性，以及用典對文章結構的意義，又在深層次上加強了魏代文章和秦漢散文的不同。⁶⁰

《文選》卷四十二的魏代作品，數量眾多，有特色，而且豐富多彩的藻繪，淋漓盡致的誇飾，也不絕於篇。……這種輕倩靈動的對句，在秦漢散文中，是見不到的，而正預示著一個對語言色澤極端重視的文學唯美時代即將到來。⁶¹

此時期大致仍是駢散兼用的文章型態，駢儷形式相當自由，也並未成為體製主要形式特徵，故尚能有輕倩靈動之感，但已廣泛運用於此時期各體文章，也漸與前代散文呈現不同風貌。本節僅先就駢儷句式進行觀察，由本節前引文例，已可見多有駢儷句（引文下加底線者為駢句），尤其如應璩〈與從弟君苗君胄書〉「聞者北遊，喜歡無量」一段，連用駢儷句式，二十三句之中，有八組十六句屬於駢

⁵⁹ 引見劉師培：《論文雜記》（臺北：廣文書局，1970年），頁7。

⁶⁰ 引見鍾濤：《六朝駢文形式及其文化意蘊》（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年），頁65-66。且該書進而統計歸納《文選》四十二卷所收錄十一篇魏代書牘文的對句數及用典句數，更可見各篇文章對偶及用典的高頻率現象。

⁶¹ 同上註，頁68-69。

句，比例高達七成，文章已明顯具有駢儷化特徵；又如前引曹植〈與吳季重書〉「然日不我與，曜靈急節」一段，於二十一句之中，有四組八句屬於對偶式駢句，比例將近四成，其駢儷風采可謂相當顯著。再就整篇駢句比例情形進行觀察，如應璩〈與廣川長岑文瑜書〉一文：

頃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礫銷鑠，草木焦卷。處涼臺而有鬱蒸之煩，浴寒水而有灼爛之慘。宇宙雖廣，無陰以憩。雲漢之詩，何以過此？土龍矯首於玄寺，泥人鶴立於闕里，修之歷旬，靜無徵效，明勸教之術，非致雨之備也。知恤下人，躬自暴露，拜起靈壇，勤亦至矣。昔夏禹之解陽盱，殷湯之禱桑林，言未發而水旋流，辭未卒而澤滂沛。今者雲重積而復散，雨垂落而復收，得無賢聖殊品，優劣異姿，割髮宜及膚，翦爪宜侵肌乎？周征殷而年豐，衛伐邢而致雨，善否之應，甚於影響，未可以為不然也。（《文選注》，卷 42，頁 610）

此篇是應璩寫給廣川縣令岑文瑜的書信，因當時廣川縣逢大旱，縣衙官員用土法祭拜祈雨，卻少見效果，故作者旁徵夏禹商湯祈雨立即靈驗之事作為對比，譏嘲當今官吏「知恤下人」之作為，以表示要求得甘霖，縣吏當效法聖賢，行德政，致精誠，上天自能感應迅疾。劉勰曾評謂：「休瑾好事，留意詞翰」，⁶²指出應璩為文好譏諷時事，留意辭章翰墨之經營的寫作特點，本篇即可印證此一觀點。全文三十七句，經統計共有九組十八句屬於對偶式駢句，比例已近五成，文章確實呈現出高度的駢儷化特徵。其中九組駢句，有四字

⁶² 引見梁·劉勰著，王更生注譯：《文心雕龍讀本·書記》（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上冊，頁 462。

對、五字對、六字對、七字對，最長達九字對，其駢散句式交融，工整研練又靈活錯落。故王利鎖調應璩書信之文「於整飭的語言中顯現出鮮明的散文氣象，讀來給人以抑揚頓挫的情致之美」，並據以指出：

應璩書信文辭采清麗，深婉典雅，結構精密，句式駢化，表現出寓駢於散、駢散渾融的獨特的藝術審美價值。……改變了漢代以來書信文的品格氣象，使書信文寫作呈現出更加濃郁的駢化特徵，對魏晉散文向駢文的轉化起到了重要的推波助瀾的作用。⁶³

依此可見，駢化不僅是魏晉文章重要的句式特徵，駢散相間互融的體式也形成了一項審美特質，這使書信文章散行之際亦有一定韻律，整練中又富含變化，因而構成詩化風采。⁶⁴

建安之世固然「開四六之先」，開啟了駢儷唯美之風，然從實際文章中的句型規律來看，則尚未達到連用駢儷或四六隔句對之定式，⁶⁵而若與南朝時期麗辭甚至徐庾以四六為主的「徐庾體」相較，其文章體製的駢儷化程度仍有顯著區別。就以《文選》中所選

⁶³ 引見王利鎖：〈應璩書信文簡論〉，《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53卷第2期（2013年03月），頁113-114。

⁶⁴ 如陳松雄〈南朝麗辭之韻化與詩化〉一文指出駢散間用可疏通壅塞文氣，有助於表現詩化之特色，其云：「散篇氣盛，苟一洩無餘，則猶排洪不停，終必乾涸。若適時間麗，敷以偶思，則辭華不孤，氣盛不竭。」論文詳參《東吳中文學報》18期（2009年11月），頁93。

⁶⁵ 如劉濤《南朝散文研究》一書亦指出：「魏代散文的駢化趨勢非常明顯，並且已具備駢文的雛形，但由於對偶所占的比例還不具壓倒之勢，所以此時尚未有嚴格意義上的駢文。」詳參劉濤：《南朝散文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頁55-56。

書體之文來看，南朝時期共有丘遲（464-508）〈與陳伯之書〉及劉峻（462-521）〈重答劉秣陵沼書〉兩篇，後者篇幅甚短，並無明顯駢儷色彩，當無需論。然前者幾乎通篇儷偶，且屬對工整，駢儷比例高，「實為當時最優秀的駢文之一」。⁶⁶故將本篇所提及建安文士諸篇書信與〈與陳伯之書〉並觀，可見建安時期行文駢儷句比例雖已達一定程度，但體式仍屬駢散交錯結合，並未有通篇高比例駢句現象，也尚未成駢四儷六定式，故確實較能賦予作品輕倩靈動之感，這也自能有助於文章之詩化表現。

六、用典曲喻之修辭

用典是在作品中藉「據事以類義」之法，亦即「綜採經史舊籍中的前言往行」，⁶⁷除可豐富事義理據，增強言說的說服力，也可透過引況為喻，發揮切喻事理的作用，故成為詩文中相當廣泛運用的修辭方法。同時也由於「援古以證今」的手法較為間接，故能「意藻綺密，義蘊深婉」，⁶⁸不僅增添文章辭藻之美，亦藉含蓄暗示，使情思意趣更為深遠曲隱，其發揮「言在此而意在彼」的表達效果，猶如詩中比興。李兆洛（1769-1841）更明確表示用典隸事之法與文意表現有關：

蓋指事欲其曲以盡，述意欲其深以婉。澤以比興，則詞不迫切；資以故籍，故言為典章也。⁶⁹

⁶⁶ 引見姜書閣：《駢文史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頁390。

⁶⁷ 引見黃永武：《字句鍛鍊法》（臺北：洪範書店，1986年），頁82。

⁶⁸ 引見黃永武：《字句鍛鍊法》，頁86。

⁶⁹ 引見清·李兆洛：《駢體文鈔》（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萬有文庫第二集，中編目錄，頁26。

指出「澤以比興」、「資以故籍」的用典手法，可使行文具有更豐富的意義及形象性，又不致於迫切，也往往能使文章表現出事理曲盡、意趣深婉的特點。王瑤也曾針對駢體中設喻所發揮的作用指出：「用事或用喻，其作用都在使其發生推理的媒介的作用。」⁷⁰即意謂用事或用喻有助於事理論述之表達，可推展文意。若從「修辭心理學」的角度來看用典，則不僅有利於推衍文意，更可修飾文意，使表達不過於平直顯露，增加意義的豐富性，如吳禮權指出：

以用典的修辭文本模式來表情達意，在表達上可以使表達者的達意傳情顯得婉約含蓄；在接受上，由於表達者在文本意義的表達與接受者的接受之間製造了「距離」，使接受者只能通過表達者所建構的修辭文本中的典故進行咀嚼、消化後才能理解其內在的含義。⁷¹

可見用典使意義顯得婉約、含蓄、蘊藉，其具曲折性的表達方法不同於直話直說，而是擴大作者（表達者）與讀者（接受者）之間的距離，使意義不易一覽無遺，故解讀尚需讀者反覆咀嚼尋繹，這解讀過程頗近似比興意義的探索，也易給予讀者富含詩性文采的審美感受。關於比興之用，《文心雕龍》從定義上予以辨別：「比者，附也；興者，起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擬議。」⁷²可見「比」法旨在「切類指事」，是藉近似事物來比附情理；「興」是「依微擬議」，則由隱微處興發內心蘊蓄情思。兩者皆以事物譬

⁷⁰ 引見王瑤：〈徐庾與駢體〉，《中古文學史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323。

⁷¹ 引見吳禮權：《修辭心理學》（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226。

⁷² 引見梁·劉勰著，王更生注譯：《文心雕龍讀本·比興》，下冊，頁145。

況，其本同而末異，殊途而同歸。⁷³以下分別闡述用典之法所構成的表達效用及文章風采。

(一) 引況以切喻事理

在書信行文之際，用典引況為喻，其辭約旨豐，除可佐證事理，並可豐富內容、深化事義，也頗能呈現文人崇尚典雅的學識風采。就幾則實際文例來看，如孔融作〈論盛孝章書〉予曹操，期盼曹操惜才，能出手援救，為喚起曹操同情，援引歷史故實為據，以理激勸，其云：

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向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臨難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文選注》，卷41，頁594）

文中燕君、昭王兩事之典，出自《戰國策·燕策》，是用燕昭王求賢，郭隗說以千金買駿馬骨之事，以及為郭隗建造宮室以師禮相待之事，一方面訴諸歷史典故權威，闡述懷抱不棄小才誠心，方能求賢納才，一方面也藉以凸顯營救盛孝章可以弘揚友道，甚而可招致賢士；另也從反面引申，假設郭隗處境危殆而昭王「不解」、「不拯」，則賢士將各自高飛遠走，不會往燕國聚集，其言外之意，也

⁷³ 關於比興兩體，清陳啟源《毛詩稽古篇》指出兩體皆屬喻，其謂：「比興皆喻，而體不同：興者，興會所至，非即非離，言在此意在彼，其詞微，其指遠；比者，一正一喻，兩相譬況，其詞決，其指顯。」引見清·陳啟源：《毛詩稽古篇》卷二十五，收錄於《皇清經解毛詩類彙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86年）。

就指陳了不拯救盛孝章的後果，故書信結尾謂「凡所稱引，自公所知」，文意雖點到為止，略顯委婉，然其引古喻今，遣辭文雅，所發揮引況切喻事理的作用相當明確深刻。林伯謙析論其文特點云：「議論風發，從友情提升到求賢，為國家救援人才的急切，寫來激昂卓犖，疏俊可誦。」⁷⁴顯見此文在危急之際仍展現從容不迫的感染力。⁷⁵

再者，陳琳〈為曹洪與魏文帝書〉為代筆之書，作於建安二十年，當時曹操西征攻入漢中，從弟曹洪任都護將軍，在前線將軍事消息回報給曹丕，全文意氣風發，洋溢著得勝之師的喜悅之情。文末為得勝之師極欲奮其文辭：

蓋聞過高唐者，效王豹之謳；遊睢渙者，學藻績之綵。間自入益部，仰司馬楊王遺風，有子勝斐然之志，故頗奮文辭，異於他日。怪乃輕其家丘，謂為倩人，是何言歟？夫綠驥垂耳於林垆。鴻雀戢翼於汙池，褻之者固以為園囿之凡鳥，外廄之下乘也。及整蘭筋，揮勁翮，陵厲清浮，顧盼千里，豈可謂其借翰於晨風，假足於六駁哉！（《文選注》，卷 41，頁 597-598）

此處先以模仿歌聲及想學藻繪之彩作為陪襯，強調自己來到益州，也仰慕昔賢遺采文風；再以駿馬垂耳、雁雀斂翼必然被視為劣馬、凡鳥，然一旦意氣昂揚、奮起展翅，就不再會被視為只是向凶禽猛

⁷⁴ 引見林伯謙：〈孔融〈薦禰衡表〉與〈論盛孝章書〉〉，《東吳中文學報》12期（2006年05月），頁29。

⁷⁵ 如何慶明評論〈論盛孝章書〉一文，即著眼於此文用典之效用，概括指出：「全〈書〉文字精鍊簡要，而氣度從容閑雅，一切點到為止。」引見柯慶明：〈「書」「箋」作為文學類型之美感特質〉，《古典中國實用文類美學》，頁110。

獸借力，以連續比喻，強調自己絕非假借他人之筆的凡庸之輩，以回應曹植稱曹洪前次來信為他人代筆之立場。其中用《孟子·告子下》「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之事及孔子被不識者輕視稱作「東家丘」之典，連續引況設喻，正可充分見到武將告捷之際，除稱頌戰功，同時也想凸顯「頗奮文辭，異於他日」的亢奮心情，此一部份在信件中的重要性並不高，但用具體形象之典故以喻事的點綴作用卻頗為顯明。又如曹丕〈與吳質書〉：

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嘆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文選注》，卷42，頁602）

此為信的開頭應酬語，援引「東山」之典，以抒發思友情懷。「東山」出自《詩經·豳風·東山》：「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自我不見，於今三年」云云，本指征士遊子敘闊別故鄉、思念親人之情，此信之意在以親情比況友情，闊別三年尚且歎恨，而「況乃過之」，運用對照之筆，以示懷思之情更甚。

另外，如曹丕〈與鍾大理書〉，是在獲贈良玉之後回覆給鍾繇（151-230）的信，其云「奉賦一篇，以讚揚麗質」，故雖是書信體，但極力馳騁辭力，筆調頗似詠物賦，並具詩化風采，是故《駢體文鈔》評曰：「書已似賦。」⁷⁶文中闡述良玉之尊貴價值，表達自己的仰慕渴求，以及企盼一睹良玉的殷切心情，其云：

良玉比德君子，珪璋見美詩人。晉之垂棘，魯之瓊璠，宋之結綠，楚之和璞，價越萬金，貴重都城，有稱疇昔，流聲將

⁷⁶ 此評引見清·李兆洛：《駢體文鈔·箋牘類》（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萬有文庫第二集，卷30，頁603。

來。是以垂棘出晉，虞虢雙禽；和璧入秦，相如抗節。竊見玉書稱美玉，白如截肪，黑譬純漆，赤擬雞冠，黃侔蒸栗，側聞斯語，未睹厥狀。雖德非君子，義無詩人，高山景行，私所仰慕。……寶玦初至，捧匣跪發，五內震駭，繩窮匣開，爛然滿目。猥以蒙鄙之姿，得睹希世之寶，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蘭生詭奪之誑，嘉貺益腆，敢不欽承。（《文選注》，卷 42，頁 603-604）

曹丕書寫此文作為酬答致謝，多以四言及駢偶排比句式鋪陳，對玉之誇讚及形容均相當具有鋪采摛文的行文效果，文中結合多則有關美玉之歷史典故。文章前半先引出春秋諸國擁有「垂棘」、「瓊璠」、「結綠」、「和璞」等價值連城之寶玉，故各國也常為寶玉而上演各式爭奪戰。關於「垂棘」、「虞虢」之典：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敢請假道以請罪於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⁷⁷

晉假道於虞滅虢，後又藉口滅虞，虞虢兩國因貪垂棘之璧而致亡國；「和璧入秦，相如抗節」典出《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是因秦王要挾趙國獻出和氏璧，藺相如見秦王貪而無意割城，故為計從秦王手中搶回玉璧，終能完璧歸趙，維護國家尊嚴，兩則典故用意一正一反，也均與寶玉有密切關聯，然其引經據典的用意，明顯並

⁷⁷ 此典出自《左傳·僖公二年》，引見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僖公二年》，《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7年），第6冊，頁199。

不在於發思古之幽情。後半則描述寶玉初至時的賞玩及驚喜之情，因此「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直接指陳獲得寶玉卻無需花費重大代價，因此文末「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蘭生詭奪之誑」兩句，延伸前述和氏璧之典，引古況今，既襯托出對方所贈寶玉實為「嘉貺」，更與前述兩則典事形成對比，在讚頌比德、詠歎美玉形象之餘，亦藉故實以寓獲此贈物實千古難得之意，使意旨新穎別致。

綜合上述用典三例來看，或借古人古事為喻，或取經典用語為喻，或用典事襯托今意，皆在行文中發揮引況以切喻事理的作用。

（二）隱寓以寄託深遠情思

運用典故除了比況事理，亦可巧妙隱寓文人曲折之情思，因而增加讀者更多聯想臆測的空間。以下舉例據以說明，如吳質〈答東阿王書〉開頭一段，在應酬之外，亦表達自謙感念之意：

誠以身賤犬馬，德輕鴻毛。至乃歷玄闕，排金門，升玉堂，伏虛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既威儀虧替，言辭漏渫。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耀穎之才。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無馮諼三窟之效。屢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凡此數者，乃質所以憤激於胸臆，懷眷而悁邑者也。

（《文選注》，卷41，頁607）

此先以自己身微德輕，竟得以高登廟堂，實已屬恩寵榮耀；接著援用毛遂、馮諼及侯嬴三位戰國門客的歷史典故，表達自身雖並無此三人之才德能力，卻能受到曹植知遇，除感念之外，也因而頗感「懷眷而悁邑」。其行文所表達態度極為恭謹謙遜，然其「憤激於

胸臆」之心情，似更寓含有較深層含義。如李景華《建安文學述評》書中對此指出：

這是繞著彎子述委屈：至今已不能像毛遂、馮諼、侯嬴那樣有所作為，英雄已經失去用武之地。言下之意非常清楚，作者是希望有像平原君、孟嘗君、信陵君那樣禮賢下士的權貴，識拔自己。⁷⁸

觀此，可略見吳質透過歷史典故名人以寄託「憤激於胸臆，懷眷而悵邑」的曲隱情思；然如前引〈答東阿王書〉末尾部分，吳質因侷促一地，「不足以揚名」、「不足以騁跡」，實有志難申，故表達希望能「改轍易御」以「效其力」之願，與書信此處開頭結合並觀，更具體呈現吳質期待當權者援引的心情。

另外，如應璩〈與侍郎曹長思書〉一文，以向友人曹肇尋求援助為旨，全篇篇幅簡短，然行文運用多則典故，感歎薄援寡助，然所寓情思卻相當委婉。以下節錄中間部分為例說明：

王肅以宿德顯授，何曾以後進見拔，皆鷹揚虎視，有萬里之望。薄援助者，不能追參於高妙，復斂翼於故枝，塊然獨處，有離羣之志。汲黯樂在郎署，何武恥為宰相，千載揆之，知其有由也。德非陳平，門無結駟之跡；學非楊雄，堂無好事之客；才劣仲舒，無下帷之思；家貧孟公，無置酒之樂。悲風起於閨闈，紅塵蔽於機榻。幸有袁生，時步玉趾，樵蘇不爨，清談而已，有似周黨之過閔子。（《文選注》，卷42，頁609）

本篇寫作年代不詳，然應璩於建安十九年為曹丕座上客，黃初元年

⁷⁸ 引見李景華：《建安文學述評》（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頁280。

任侍郎，⁷⁹其後似已無需要向另一侍郎求援之理，故應寫於受到舉薦之前。此處先引王肅、何曾之事為例，表示兩人機遇不同，一受重用之後，方能大展如「鷹揚虎視」之雄才，也才有獲得功名富貴的機會。王肅（195-256）在《三國志·魏書》中有本傳，在黃初中為散騎黃門侍郎，何曾（199-279）在《晉書》中有本傳，弱冠即累遷散騎侍郎；⁸⁰曹肇亦曾任散騎侍郎，故作者特引兩位當世之人為例，又皆曾任散騎侍郎，駱鴻凱評曰：「王肅四語，興感之由。」⁸¹是故考其用典之旨，似當有多層深意：第一，作為類比，引發曹長思相同處境的同理心；再者，無論「宿德」或「後進」，只要受薦拔，均能施展長才；第三，應據自視祖上世居高位（即「宿德」），與王肅相比，並不遜色，身為後起才俊（即「後進」），也應有何曾見拔之待遇。然而「薄援助者，不能追參於高妙」，乏人援助，故僅能「復斂翼於故枝，塊然獨處」，以喻自己一籌莫展，此處用典期許獲得薦舉心境，又似有難言之隱。其後再引用漢代「汲黯樂在郎署，何武恥為宰相」之典，表示兩人不願為官，實有來由，但自己鬱不得志，仍正待機會，未必願意步兩人後塵。接著再以陳平、揚雄、董仲舒、陳遵（孟公）這幾位漢代歷史名人為典，襯托出自

⁷⁹ 此根據陸侃如：《中古文學繫年》（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下冊，頁396、437。

⁸⁰ 王肅之事，詳參《三國志·魏書十三·王朗傳子名肅》：「肅字子雍。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為之解。黃初中，為散騎黃門侍郎。太和三年，拜散騎常侍。……正始元年，出為廣平太守。公事徵還，拜議郎。頃之，為侍中，遷太常。」何曾之事，詳參《晉書·卷三十三·列傳第三》：「何曾，字穎考，陳國陽夏人也。……魏明帝初為平原侯，曾為文學。及即位，累遷散騎侍郎、汲郡典農中郎將、給事黃門侍郎。」

⁸¹ 引見駱鴻凱：《文選學·附補編·文選分體研究舉例》，頁502。

己低微處境，此處連續言「德非陳平」、「學非揚雄」、「才劣仲舒」、「家貧孟公」，表面上雖說自己才德學識不如諸賢，但心理上卻願以諸賢自詡自期，間接展現文人懷抱。「悲風起於閨闔，紅塵蔽於機榻」，則是作者此時蟄伏，待價而沽，心境不免落寞悲涼的寫照；最後，幸有友人袁生時常來訪，「樵蘇不爨，清談而已」，指雖無食無酒招待，卻能志同道合，清談相對，故同時又借「周黨之過閔子」之典，類喻兩人以淡泊心志相交。此一用典，⁸²旨在表達自己「不戚戚於貧賤」的人生志趣。本篇書信行文引用多則歷史典故，與自身「薄援助者，不能追參於高妙」的心理訴求結合，或抒發懷才難遇、一籌莫展之心情，或引借前賢事蹟自敘懷抱，或道出目前淡泊以對的處境，故藉此信「聊為大弟陳其苦懷」，具有抒情性。清李兆洛《駢體文鈔》有評者曰：「尺幅有噴薄之勢。」⁸³本篇主要是藉書信排遣苦悶心情，雖其篇幅簡短，但也因其情思豐富，多所起伏，故有「噴薄之勢」，深層文意亦頗為曲隱難測。

以上所引兩則用典例，均與自薦、求取援引之旨意相關，可見作者藉由書信文字「散鬱陶」時，也曲折表述心跡，此當為頗具文人作風的表達方式。

七、結語

書信體是文人「心聲之獻酬」，其本質及出發點多出於實用考

⁸² 《文選注》引《東觀漢紀》云：「太原閔貢，字仲叔，與周黨相遇，含菽飲水，無菜茹也。」參見《文選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91年），卷42，頁609。

⁸³ 依《駢體文鈔》目錄後題記，此評蓋譚獻所書，引見清·李兆洛：《駢體文鈔》（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萬有文庫第二集，卷30，頁674。

量，然在文人靈心巧筆點化下，不僅「事出於沈思」，以「立意」為宗，並且也「義歸乎翰藻」，頗有「能文」的表現，因此多數作品均能情理兼佳，在「書論宜理」的名理之常及理性特徵外，還能藉文章「散鬱陶」、「託風采」，展現出感性及作家的獨特個性，並可呈顯「文明從容」的文學美感。

從文學發展脈絡來看，建安文士諸篇「書」體文章，在駢儷文風的推助之下，正展現了「心聲心畫」以至於「讚論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這一路從務真，進而重情，甚而唯美的遷變軌跡。本文以《文選》所收錄建安文士「書」體為探究範圍，從四個面向展開，兼顧創作主體及作品本體的角度，考察諸篇書體文章所展現的詩化風采，也可從中窺見建安文士的心聲及諸篇文章中所涵蘊的文學美感。主要論點可歸納如下：

在憂生傷逝之情懷方面，建安文士之詩文多能富有「建安風骨」的精神，親友故舊在書信中放言敘心，或慷慨以表意，或磊落以抒懷，時有感慨人生如朝露、人生易逝的憂患情懷，展現「志深而筆長」之抒情特點，而這也正可呼應《文選》「事出於沈思」此一選文標準。

在縱橫馳騁之文思方面，文人作家或藉由書信抒發己懷，或在「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談笑」的飲宴情境下藉酒興揮灑想像力，其情意率直，描寫靈活生動，甚至誇大鋪張，在淋漓酣暢的文字中，既透顯慷慨縱橫、激揚熱切的才情文思，也展現恣意率性、無所拘忌的通脫文風，作家在這些筆墨所呈現的形象，有如情思躍動、想像豐富的詩人，篇章中充滿詩化風采。

在駢辭儷偶之句式方面，書信文章大量運用四言句式，並適時搭配六言句式，形成相當整練的句式規律，故具有詩化風采，此法

「化詩為文」，不僅敘事、寫景如此，說理、抒情亦然；且遣辭造句多用駢儷，使語言及節奏更顯得工整凝鍊，故散體行文亦有一定韻律，作品體勢整練又富含變化，這些也增添了書信文章的音樂性及詩性特徵。

在用典曲喻之修辭方面，用典可豐富事義理據，增強言說的說服力，並使意義顯得更為婉約、含蓄、蘊藉，其具比興的曲折意義，可說是相當具有文人作風的表述方式。從比的角度來看，諸篇書信或借古人古事為喻，或取經典用語為喻，或用典事襯托今意，皆在文章中透過引況，發揮切喻事理的作用。從興的角度來看，書信中時有用典隱喻文人情思，曲折表述心跡，也更增加讀者的聯想臆測的空間，這種手法也易給予讀者富含詩性文采的審美感受。

建安文士運用詩性的思維與語言，造就出不同於其他時期的文章體勢，以上這四項特點的交融匯聚，正是為諸篇書體文章點綴詩化風采的重要關鍵；而其由求真進而重情、求美的體製發展趨勢，也看到書信與詩賦等純文學體裁之間已有不少融通之處，這些考察不但可作為透顯文學史風貌的一個側面，也可更深入呈現建安文章的特殊體貌。

引用書目

一、古籍

1. 漢·揚雄撰，韓敬注：《法言注》，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
2.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十三經注疏》，第6冊，臺北：藝文印書館，2007年。
3. 北齊·顏之推撰，王利器注：《顏氏家訓集解》，臺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3年。
4. 梁·鍾嶸著，陳延傑注：《詩品注》，臺北：里仁書局，1992年。
5. 梁·劉勰著，王更生注譯：《文心雕龍讀本》，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
6. 唐·李善：《文選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91年。
7. 明·吳訥：《文章辨體序說》，《文體序說三種》，臺北：大安出版社，1998年。
8. 清·于光華：《評註昭明文選》，上海：掃葉山房，1923年。
9. 清·李兆洛：《駢體文鈔》，上海：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第二集，1937年。
10. 清·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王承略、劉心明主編：《二十五史藝文經籍志考補萃編》第4冊，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4年。
11. 清·陳啟源：《毛詩稽古篇》，《皇清經解毛詩類彙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86年。

12. 清·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

二、專書 / 專書論文

1. 王玫：《建安文學接受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2. 王瑤：《中古文學史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3. 朱雅琪：《魏晉詩歌中的審美意識》，臺北：花木蘭出版社，2007年。
4. 吳禮權：《修辭心理學》，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5. 李景華：《建安文學述評》，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
6. 李澤厚：《美學三書·美的歷程》，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年。
7. 姜書閣：《駢文史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
8. 柯慶明：《古典中國實用文類美學》，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年。
9. 馬自力：《餘霞散成綺——古代散文創作》，臺北：萬卷樓，1999年。
10. 高步瀛：《魏晉文學要》，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
11. 郭殿忱、李紅光：〈論文選之書體〉，《昭明文選與中國傳統文化》，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
12. 陳必祥：《古代散文文體概論》，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
13. 陳昌明：《緣情文學觀》，臺北：臺灣書店，1999年。
14. 陳洪：《詩化人生——魏晉風度的魅力》，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1年。

15. 陸侃如：《中古文學繫年》，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
16. 黃永武：《字句鍛鍊法》，臺北：洪範書店，1986年。
17. 熊禮匯：《中國古代散文藝術二十四講》，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年。
18. 褚斌杰：《中國古代文體概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
19. 趙樹功：《中國尺牘文學史》，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
20. 劉衍主編：《中國散文史綱》，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
21. 劉師培：《論文雜記》，臺北：廣文書局，1970年。
22. 劉濤：《南朝散文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
23. 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而已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
24. 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三）》，臺北：聯經出版社，1998年。
25. 駱鴻凱：《文選學》，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
26. 薛鳳昌：《文體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
27. 鍾濤：《六朝駢文形式及其文化意蘊》，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年。
28. 日·弘法大師撰，王利器校注：《文鏡秘府論校注》，臺北：貫雅文化事業，1991年。

三、 學位論文

1. 吳瑋潔：《三國時期書信研究》，臺南：國立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11年。

四、 期刊論文

1. 王利鎖：〈應璩書信文簡論〉，《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53卷第2期，2013年03月，頁109-114。
2. 林伯謙：〈孔融〈薦禰衡表〉與〈論盛孝章書〉〉，《東吳中文學報》第12期，2006年05月，頁1-38。
3. 陳松雄：〈南朝麗辭之韻化與詩化〉，《東吳中文學報》第18期，2009年11月，頁85-98。
4. 趙俊玲：〈論《文選》所收建安時期書信〉，《西南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8卷第3期，2007年06月，頁70-73。
5. 趙俊玲：〈《文心雕龍》與《文選》書信觀辨析〉，《聊城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3期，2016年06月，頁35-40。